

曹魏墓葬时代特征新识

——以荥阳南楚楼M3为中心

李宏飞

关键词：南楚楼M3 墓葬年代 曹魏墓葬 洛阳及其附近地区

KEYWORDS: Tomb No. 3 at Nanchulou Tomb Dating Cao Wei Period Tombs Luoyang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ABSTRACT: Through examination of tomb forms, epochal characteristics of grave goods, pottery vessel assemblages, and the presence of specific grave goods with clear chronological markers, this study infers that tomb No. 3 at Nanchulou in Xingyang, Henan, dates approximately to the early Cao Wei period. Through comparison to other typical tombs, Cao Wei tombs are subdivided into two phases: early Cao Wei and late Cao Wei. The tombs of the Cao Wei period in Luoyang and neighboring areas inherited most features of late Eastern Han period tombs, further amplifying elements that had emerged but were not yet prevalent in late Eastern Han period tombs, such as four-handled jars; additionally, a few new elements and modifications to existing ones were introduced. This understanding contributes to the advancement of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studies and facilitates deeper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stic transitions and cultural patterns.

长期以来，由于纪年墓和以出土文字材料能自证墓主的墓葬较为缺乏，曹魏墓葬一直是汉晋时期墓葬研究的薄弱环节，即使在曹魏政权统治中心的洛阳地区，能够判断为曹魏时期的墓葬也可谓屈指可数。

迄今所知洛阳地区唯一的曹魏纪年墓是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洛阳涧西16工区（矿山厂）M2035，因所出铁帐架有铭文“正始八年八月……”而被认定为“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1]（下文简称矿山厂M2035）。这是考古上首次发现并辨识的曹魏墓葬。基于对该墓年代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偃师杏园M6被认为“从墓葬形制到内容均与洛阳16工区曹魏墓相近，其时代也应去曹魏

不远”^[2]。洛阳东郊M178也因与洛阳矿山厂M2035、偃师杏园M6和洛阳晋墓M1^[3]的时代特征近似，“说明该墓的随葬品具有从曹魏墓向西晋墓的过渡性形态。其年代应为曹魏晚期至西晋早期”^[4]。此后对于洛阳地区曹魏墓葬的年代判断，皆建立在对上述墓葬的既有认识之上。如近年发现的洛阳西朱村M1“因为部分器物与洛阳正始八年墓所出更为接近，所以我们倾向于M1的年代可能为曹魏中晚期”^[5]。新安C12M262也是基于与洛阳矿山厂M2035、洛阳东郊M178等墓的相似性，被认为“具有从曹魏晚期向西晋的过渡形态，其年代应为曹魏晚期至西晋早期”^[6]。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还对曹魏墓葬的

作者：李宏飞，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主要特征^[7]和阶段划分^[8]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概括。然而，学界关于洛阳矿山厂M2035和偃师杏园M6的年代也存在不同看法，前者“据铭文只能断定该墓年代的上限，其埋葬年代不能早于正始八年，从类型学角度观察，我们认为该墓应划在第二期晚段，即西晋早期”^[9]，后者在过去已有学者论及“更似是东汉晚期墓葬”^[10]，近来更有学者以专文论证其就是一座东汉晚期墓葬^[11]。随着资料积累和认识深入，洛阳矿山厂M2035的墓葬年代约在不早于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的曹魏后期应无问题，而偃师杏园M6确应是东汉晚期墓葬。认定基点发生变化，便会导致相关问题的系统性认识调整，对于洛阳地区曹魏墓葬的特征判断和阶段划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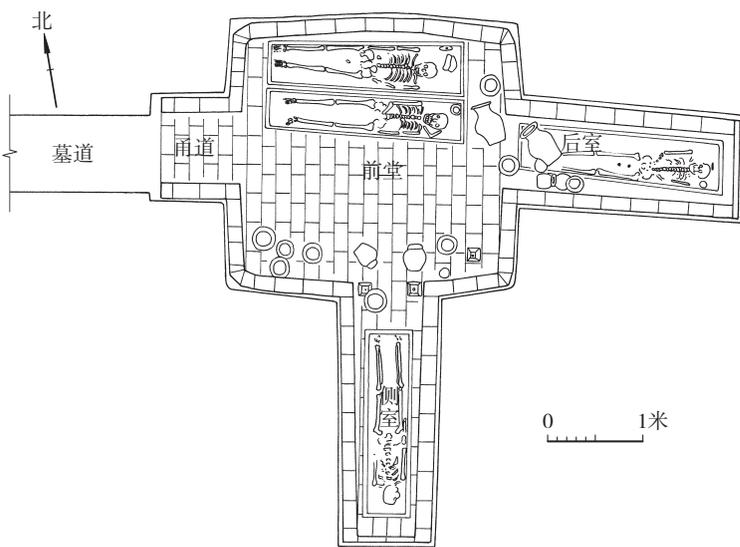
迄今所知洛阳地区唯一能以出土文字材料自证墓主的曹魏墓葬仅有孟津三十里铺ZM44（曹休墓），这也是该地区目前唯一确定的曹魏前期墓葬。然而，由于该墓“被盗严重，出土器物数量不多，多失去原来摆放位置”，并且残损严重^[12]，限制了对洛阳地区曹魏前期墓葬时代特征的全面认识。

曹魏政权存在近半个世纪，接近西晋王朝的统治时长，但目前确定属于曹魏时期的墓葬仍然很少^[13]，尤其缺乏曹魏前期墓葬，而仅洛阳地区发现的西晋墓葬已有约200座^[14]。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相称的，曹魏墓葬并非缺乏考古发现，而是没有被辨识出来，理应有相当多此时期墓葬客观存在。纪年材料和自证墓主材料是相对稀缺的，面对时代特征较为明显的典型墓葬，仍有运用考古研究方法深入研判的必要，过去对西安草厂坡1号墓年代的认识

便是类似的典型范例^[15]。本文通过对河南荥阳南楚楼M3墓葬形制、随葬器物、随葬陶器组合和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特定随葬品的系统考察，推定其年代约在曹魏前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以往发表的考古资料和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对曹魏墓葬的阶段划分和主要特征得出一些新认识，为曹魏墓葬的辨识提供研究启示。

一、荥阳南楚楼M3为曹魏墓葬的辨识

河南荥阳市西邻洛阳地区，是汉晋墓葬发现较多的地域^[16]。荥阳西新区310国道北侧南楚楼村附近曾发掘4座墓葬，其中M3、M4被定为晋墓^[17]。南楚楼M3是一座多室砖墓，由西向斜坡墓道、甬道、弧方形前堂、后室和侧室构成。甬道前用小砖和空心砖砌筑两道封门。甬道壁及墓室壁皆用小砖错缝顺砌，地面为小砖错缝平铺。后室和侧室各置一棺，前堂北侧并置两棺。朝向墓道的后室应是长辈（女性），前堂北侧二棺（南棺男性、北棺女性）应是晚辈夫妇，侧室人骨性别不详（图一）。随葬器物共计60件（包括铜钱28枚），按质地分为陶器、银器、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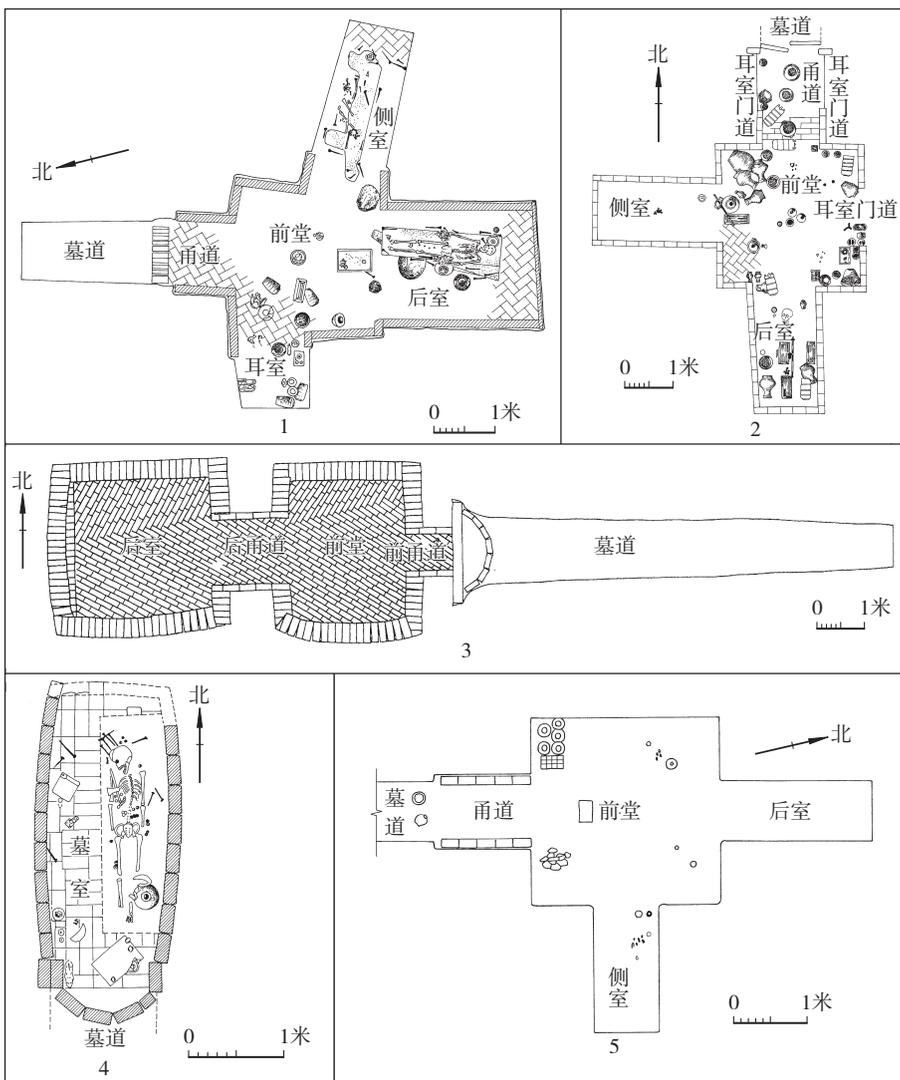


图一 南楚楼M3平面图
 （据《河南荥阳晋墓、唐墓发掘简报》图一〇改绘）

器、铁器、骨器，另有漆器朽毁不辨。南楚楼M3曾被认为是洛阳地区西晋墓中“典型的三室墓”^[18]。但实际上时代特征明显偏早，应当是一座曹魏前期墓葬。以下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 墓葬形制

根据《洛阳烧沟汉墓》，以方形前堂为中心、后接后室、旁开侧室的墓葬形制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如烧沟M1029，该墓被排在烧沟汉墓第五期之末^[19]，年代大体接近东汉晚期（图二，1）。洛阳西郊汉墓M3247^[20]（图二，2）、郑州纺织机械厂油库汉墓M1^[21]也是相似形制。魏晋墓仍有形制相似者，如魏末晋初的洛阳东郊M178和洛阳衡山路晋墓DM118^[22]（图二，5）。南楚楼M3的墓葬形制与洛阳西郊汉墓M3247、洛阳衡山路晋墓DM118较为接近。南楚楼M3前堂的四壁外弧，这在过去一般被认为是西晋墓的常见特征^[23]，但中原地区东汉墓也有



图二 墓葬形制对比图

1. 洛阳烧沟M1029 2. 洛阳西郊M3247 3. 新郑周庄M5 4. 郑州碧沙岗M13 5. 洛阳衡山路DM118
 (1据《洛阳烧沟汉墓》图三三甲-1改绘, 2据《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图七改绘, 3据《新郑市和庄镇周庄汉墓发掘简报》图四-1改绘, 4据《河南郑州市碧沙岗公园东汉墓》图一改绘, 5据《洛阳衡山路西晋墓发掘简报》图六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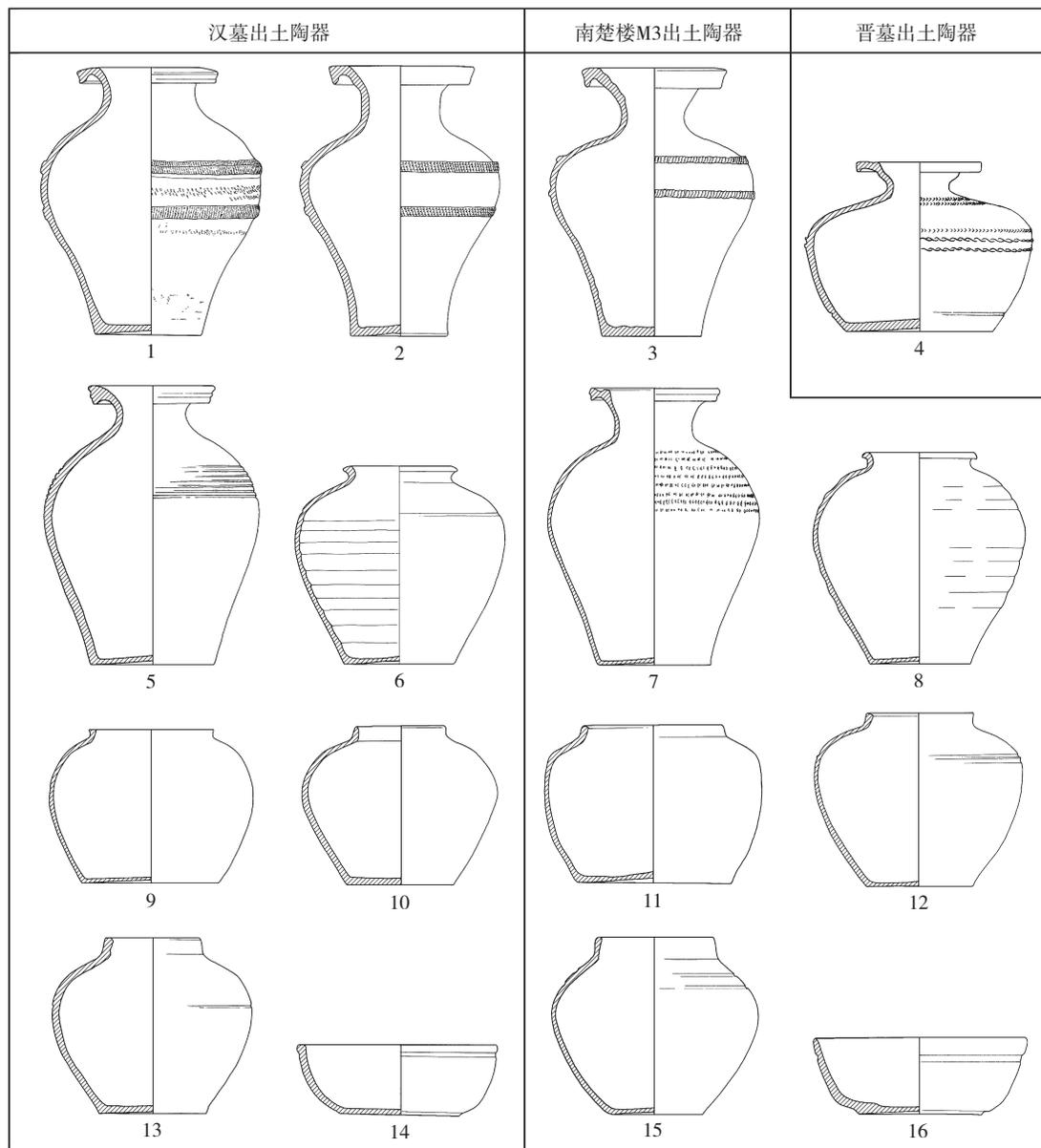
墓壁外弧者，如郑州碧沙岗M13^[24]（图二，4）、新郑周庄M5^[25]（图二，3）、鹤壁后营M256^[26]等。南楚楼M3以两块并立空心砖封门，类似方式虽在汉墓中较为常见，但在晋墓中仍有发现^[27]。单从墓葬形制方面考察，仅能将南楚楼M3的年代排在汉晋时期这一年代范围内。

(二) 随葬器物

1. 陶器 南楚楼M3随葬陶容器分为高

体罐、矮体罐、碗三大类，皆可在汉墓中找到形制非常近似者。河南登封双庙东汉中期墓葬M50所出高体宽方唇陶罐沿面外压，颈部粗矮，下腹收束^[28]（图三，1），属于较早形态。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东汉晚期墓葬

92M20所出者沿面较平，颈部细高，下腹更为收束^[29]（图三，2），已与南楚楼M3所出者（图三，3）非常近似。此类陶罐的肩腹部饰两道附加堆纹，西晋墓中一类肩腹饰附加堆纹的宽矮体陶罐应由此发展而来，如洛阳



图三 随葬陶器对比图

1~3、5~8.高体罐（M50：23、92M20：11、M3：24、M3：17、M34：3、M3：11、M3：23） 4、9~13、15.矮体罐（FM5：31、M1：97、M1：12、M3：28、M3：7、M13：9、M3：2） 14、16.碗（M1：26、M3：25）（1.登封双庙M50出土，2.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92M20出土，3、7、8、11、12、15、16.荥阳南楚楼M3出土，4.洛阳谷水FM5出土，5.郑州鸿城服饰广场M3出土，6.郑州同洲花园小区M34出土，9.巩义新华小区M1出土，10、14.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40分厂M1出土，13.郑州碧沙岗M13出土）

晋墓M20：80^[30]、衡山路HM719：29^[31]、谷水FM5：31^[32]（图三，4）、荥阳鲁庄M1：1^[33]等。高体陶罐M3：11（图三，7）、M3：23（图三，8）是汉墓中的常见陶罐形制，相似者有郑州鸿城服饰广场M3：17^[34]（图三，5）、郑州同洲花园小区M34：3^[35]（图三，6）。矮体陶罐M3：28（图三，11）、M3：7（图三，12）为矮领，鼓肩，近似者有巩义新华小区M1：97^[36]（图三，9）、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40分厂M1：12^[37]（图三，10）。矮体陶罐M3：3、2为高直领，溜肩（图三，15），近似者有郑州碧沙岗M13：9（图三，13）。陶碗M3：25为矮圈足（图三，16），近似者有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40分厂M1：26（图三，14），未见魏晋时期陶碗内壁常见的密集篦点。

南楚楼M3前堂南侧发现的陶帐座为盥顶形（图四，4、5）。此类帐座过去一般认为常见于晋墓^[38]。根据近年温县南张羌墓地的考古新资料，盥顶形陶帐座在该墓地的M141^[39]（图四，1、2）、M37^[40]（图四，3）皆有发现，后者为典型的西晋墓，前者被归为东汉晚期墓，但其随葬器物群面貌与同墓地其他东汉晚期墓葬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不排除年代进入曹魏时期。魏末晋初的洛阳东郊M178也出土了相同样式的陶帐座（图四，6）。由此可见，盥顶形陶帐座虽在晋墓中较为流行，但在曹魏墓中应当已经出现。

2.银器 南楚楼M3前堂北棺和后室棺内女性头部发现银钗，前堂北棺女性手臂处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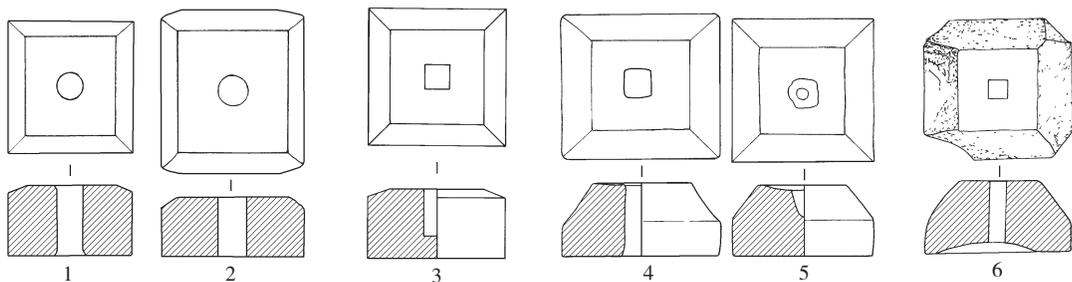
现银钗。巩义新华小区汉墓M1发现银钗、钗、指环等，表明东汉已存在此类银饰品。西晋墓中也常见此类银饰品，乃是自汉代传承而来。此类银饰品形制较为简单，南楚楼所出者与其他汉晋时期墓葬所见无甚差异。

3.铜器 铜镜是汉晋墓葬的常见随葬器物，是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参考对象。南楚楼M3随葬3件铜镜，分别为虎纹镜、连弧纹镜和位至三公镜，皆为宽素缘。

南楚楼M3前堂北棺女性头部附近铜镜M3：15的镜背为锯齿纹、栉齿纹和虎纹的纹饰组合，与东汉晚期流行的龙虎钱纹镜颇有相近之处，但仅能辨识虎头，虎口处的圆圈可能是铜钱的简化形象。纹饰组合与之较为相近的有西安市长安区三里村东汉墓所出龙虎镜^[41]。西晋时期仍然存在类似纹饰组合的铜镜，如洛阳涧西矿山机械厂晋墓M31所出三虎镜^[42]。

南楚楼M3前堂南棺男性头旁铜镜M3：13为“内连弧凹面圈带镜。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为内连弧纹带，一周凹面圈带之外为素面宽平边缘”。由于残损严重，简报未发表该器物的线图、照片或拓本，但在结语中提及其“与嵩县果酒厂晋墓的铜镜相似”。此型连弧纹镜在东汉晚期较为常见，魏晋时期仍然可见^[43]。

南楚楼M3后室女性头部附近铜镜M3：29的镜背中间有直行铭文“位至三公”，两侧饰夔纹。此型铜镜通常被称为“位至三公镜”，过去认为出现于曹魏时期，流行于西晋时



图四 随葬陶帐座对比图

1、2.温县南张羌M141：9、10 3.温县南张羌M37：2 4、5.荥阳南楚楼M3：32、33 6.洛阳东郊M178：15

期^[44]，如今可知东汉时期已经出现^[45]。东汉主要有两类“位至三公”铭文铜镜。常见的一类是“四叶纹式位至三公镜”，如洛阳中州路M813：1^[46]、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40分厂M1：71、巩义新华小区M1：50、郑州碧沙岗M13：1等。另一类是“双夔直栏式位至三公镜”，如洛阳西郊汉墓M3177：12^[47]、辉县汉墓2009HCDM18：2^[48]等，为直行单向铭文；湖北随县唐镇M3：21^[49]等，为夹钮对置铭文。魏末晋初的洛阳东郊M178也出土了双夔直栏式位至三公镜。

此外，南楚楼M3所出铜钗M3：18、19与银钗M3：17同出于前堂北棺的女性墓主头部，除质地不同外，形制亦无甚差别。该墓还随葬铜钱28枚，为五铢钱和货泉，常见于汉晋墓中，由于锈蚀严重，未发表拓本或照片，具体情况不明。

4. 铁器 包括灯和犁铧。铁灯为三足，灯盘口沿之上有三处“乳状小钮”，实际是上部锈蚀后的残存部分，原本应是1件笼状浅盘铁灯，相似者有洛阳烧沟汉墓M1035：61^[50]。此外，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I1^[51]、湖南耒阳M127^[52]、江西南昌青云谱M1^[53]也曾发现特征相近的笼状铁灯，可见此类铁灯在汉代已广泛存在。南楚楼M3前堂南棺内为男性骨架，随葬铁犁铧，是汉代以来流行的农具^[54]。

5. 骨器 仅有骨珠。类似的骨珠曾出土于洛阳西郊汉墓M5003^[55]。

南楚楼M3为合葬墓，虽然简报并未明确说明有二次或多次合葬迹象，仍有必要对其可能存在的合葬年代问题进行讨论。除棺内器物外，墓中其他随葬器物以陶器为大宗，分为后室近外侧至前堂东侧、前堂南侧两群，前者包括高体陶罐和矮体陶罐，后者包括矮体陶罐和盃顶形陶帐座，似乎略有早晚差异，但除盃顶形陶帐座外的其他绝大多数随葬品皆可在汉墓中找到近似者，在器物时代特征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表明该墓从最

初营建到最终合葬的时间相距并不远。

（三）随葬陶器组合和特定随葬品组成

南楚楼M3所出高体宽方唇陶罐与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东汉晚期墓葬92M20所出者非常近似，说明两者的年代相距不远。后者虽遭严重破坏，仍出土矮体陶罐、案、耳杯、井、灶、圈厕、楼等典型汉式陶器。南楚楼M3随葬陶容器仅有高体、矮体陶罐和陶碗，尤以矮体陶罐的数量较多，这是随葬陶器组合上较为突出的变化特点。不同样式的位至三公铜镜流行时段明显不同，以盃顶形者为典型的陶帐座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将出土这两种特定随葬品的汉晋时期典型墓例按照组成变化排成序列（表一），可进一步推定南楚楼M3的年代。

东汉晚期墓葬以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40分厂M1（东汉光和二年即公元179年王当墓）、巩义新华小区M1、郑州碧沙岗M13、洛阳中州路M813（东汉初平二年即公元191年墓）等为典型墓例。前两者为东汉晚期常见的前堂横列墓。随葬典型汉式陶器组合，包括陶壶、解注瓶、折腹瓮、樽、勺、案、耳杯、方盒、仓、井、灶、炉、圈厕、鸡、狗等和四叶纹式位至三公铜镜。南楚楼M3随葬器物特征虽与东汉晚期墓所出者非常近似，但随葬陶器组合与典型汉式陶器组合明显不同，双夔直栏式位至三公铜镜和盃顶形陶帐座也表现出特定随葬品组成上的显著差异，表明该墓应是在相近时段内发生的文化面貌变革。

西晋墓葬以洛阳衡山路DM118、辽宁路BM123^[56]、谷水FM5、郑州上街水厂M8^[57]等为典型墓例。墓葬形制以方形单室墓为主，有的在砖室四隅砖砌角柱，也有带方形前堂的多室土洞墓。随葬典型晋式陶器组合，包括矮体侍俑、长方形榻、武士俑、牛车、镇墓兽等和双夔直栏式位至三公铜镜，也常见陶帐座。南楚楼M3与典型西晋墓相比，缺乏新见陶器器类，与典型晋式陶器组合差异较

表一 随葬陶器组合和特定随葬品组成变化一览表

典型墓例	陶器组合	位至三公铜镜	陶帐座	墓葬形制
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40分厂M1	典型汉式	四叶纹式		横前堂、双室土洞墓
巩义新华小区M1	典型汉式	四叶纹式		横前堂、双室砖墓
郑州碧沙岗M13	典型汉式	四叶纹式		弧边单室砖墓
洛阳中州路M813	典型汉式	四叶纹式		砖棺墓
荥阳南楚楼M3	中间形态	双夔直栏式	盝顶形	弧方形前堂、多室砖墓
洛阳东郊M178	中间形态	双夔直栏式	盝顶形、平顶方形	方形前堂、双室土洞墓
洛阳衡山路DM118	典型晋式	四叶纹式、双夔直栏式		方形前堂、多室土洞墓
郑州上街水厂M8	典型晋式	双夔直栏式	盝顶形	方形单室砖墓
洛阳辽宁路BM123	典型晋式	双夔直栏式	覆钵形	方形单室砖墓、四隅砖砌角柱
洛阳谷水FM5	典型晋式	双夔直栏式	平顶方形、不规则圆饼形	方形单室砖墓、四隅砖砌角柱

大，但所出双夔直栏式位至三公铜镜和盝顶形陶帐座又表现出与西晋墓所出同类器的相近之处。

对比可知，南楚楼M3在随葬陶器组合和特定随葬品组成上，既不同于典型东汉晚期墓葬，也不同于典型西晋墓葬，其时代特征恰好处于两者之间，可推定为曹魏墓葬。具体地说，南楚楼M3仍然保留汉式高体陶罐，年代与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东汉晚期墓葬92M20相去不远，并无典型晋墓的新见陶器器类，相比魏末晋初的洛阳东郊M178具有更早的时代特征，其年代约在曹魏前期。

二、曹魏墓葬阶段划分和主要特征的新认识

南楚楼M3的年代辨识，为洛阳及其附近地区曹魏墓葬研究提供了又一典型墓例，也为深入认识曹魏前期墓葬特征提供了较重要资料。在此基础上，结合以往相关发掘材料和近年考古新发现，对曹魏墓葬阶段划分和主要特征得出一些新认识。

（一）曹魏墓葬的阶段划分

根据现知自证墓主材料和纪年材料，河南安阳西高穴M2、孟津三十里铺ZM44、山东东阿曹植墓的年代下限在公元230年前

后，河南洛阳矿山厂M2035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248年。据此可将曹魏墓葬分为前、后两期，曹魏前期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于汉末至曹魏文帝、明帝时期，曹魏后期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于曹魏三少帝时期至晋初。

1.曹魏前期 过去关于洛阳及其附近地区曹魏前期墓葬的认识，皆以偃师杏园M6作为典型墓例，然而该墓确应是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因此需要在研究中加以排除。洛阳地区迄今唯一确定的曹魏前期墓葬是孟津三十里铺ZM44（曹休墓），但因严重盗扰，出土器物并不丰富，故补充选取洛阳地区以外的河南安阳西高穴M2^[58]、山东东阿曹植墓^[59]两座墓主明确的高等级墓葬。上述三墓为深入认识汉末至曹魏前期高等级墓葬的时代特征提供了可靠基点。此外，巩义石家庄M11^[60]与南楚楼M3非常相似，也可纳入曹魏前期墓葬的讨论。

安阳西高穴M2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墓主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下葬时仍然处于东汉末年，故墓葬形制仍是汉墓特征。但其卞皇后死于曹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该墓也有二次开挖墓道的证据，墓中部分随葬品的年代应已晚至曹魏前期，可知该墓年代跨汉末魏初。墓道东向，斜坡墓道两侧有7级台阶。

该墓为多室砖墓，方形前堂和后室的两侧各有侧室。地面为铺地石，墓壁为一顺一丁砖砌，前堂及其北侧室、后室为四面结顶穹隆顶，前后甬道、前堂连接的南侧室以及后室连接的南北两侧室皆为横券顶。虽遭严重盗扰，仍然出土陶鼎、壶、灶、井、圈厕、案、耳杯、碗、樽等汉式陶器。值得注意的是四系罐的发达，所出11件瓷罐有9件为四系罐，其余2件分别为双系罐和六系罐，另出1件陶四系罐。陶碗、盘的数量也较多。存在矮体侍俑、圆形榻、空柱盆、铁帐构件和石榻。

曹休死于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但孟津三十里铺ZM44因是多室合葬墓，年代下限可能更晚一些。墓道东向，斜坡墓道两侧和墓圻皆有7级台阶。近方形前堂西接后室，南北各有侧室，甬道北侧有并列接于前堂的耳室。地面为小砖错缝平铺，墓壁为一顺一丁砖砌，甬道及各室皆为横券顶。该墓有木质封门，各墓室之间也有木质隔门。随葬器群整体面貌已不可知，但仍出土陶四系罐5件、陶碗13件，也表现出这两类器物的发达。陶碗内壁有篦点纹。另有陶盘、盆、耳杯、灯、勺等器类。

曹植死于曹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但曹植墓的铭文砖显示太和七年（公元233年）仍在营建^[61]。墓道西向，为前后双室墓，前堂为方形。墓壁采用“三横一竖”砖砌，前堂为横券顶。随葬陶器包括井、灶、案、耳杯、鸡、狗等汉式陶器，也有空柱盆，同样表现出四系罐、矮体陶罐、碗、盘等器类的数量相对较多。

南楚楼M3尽管未随葬四系罐，却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矮体陶罐。如果说前述三墓因是高等级墓葬而随葬数量较多的四系罐、矮体罐、碗等，该墓则作为等级相对较低的墓例证明，此阶段确实流行随葬矮体陶容器。此外，附近的南楚楼M4墓道同为西向，由带天井的半斜坡墓道、前甬道、方形前堂、后甬

道、长方形后室构成，曾被盗扰，出土矮体陶罐（包含四系罐）、陶碗和锈蚀严重的铜钱，墓葬年代可能也在曹魏时期。

巩义石家庄M11也是多室砖墓，由斜坡墓道、砖砌前甬道、前堂、后甬道、后室和土洞侧室、耳室构成。墓道南向，方形前堂四壁外弧。地面为小砖错缝平铺，墓壁为“三顺一侧”砌法，券顶为“侧身顶头起券”。随葬铜熏炉与巩义新华小区汉墓M1所出者相似。随葬四叶八凤纹铜镜与湖北鄂城M1006、M5010^[62]等孙吴前期墓所出者相似。随葬陶器仅有10件陶罐，“口系直口，肩部并有小鼻”，突显矮体带系陶罐的流行。发掘者还注意到陶器群“没有汉代流行的瓮、壶、仓、灶等器物”。随葬铜钱包含五铢、剪轮五铢和货泉。巩义石家庄M11墓葬形制和器物群特征均与南楚楼M3颇为近似，可作为曹魏前期墓葬的又一典型墓例。

综上所述，曹魏前期墓葬仍然流行合葬墓，流行方形（弧方形）或近方形前堂，高规格墓葬仍然流行带侧方台阶的斜坡墓道。墓壁常见一顺一丁或三顺一丁砌法。除四面结顶穹隆顶，方形或近方形前堂也有采用横券顶者。随葬陶器基本属于东汉晚期器形的延续，但器类构成和组合关系发生显著变化，汉式陶礼器、高体陶罐和部分模型明器趋于减少乃至消失，四系罐、矮体罐、碗、盘等矮体浅腹陶器的数量较多，陶碗内壁有篦点纹，也有矮体侍俑、圆形榻、空柱盆、盃顶形陶帐座。铜镜有双夔直栏式位至三公镜、虎纹镜、连弧纹镜、四叶八凤纹镜。石榻、铁帐构件也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2. 曹魏后期 目前较为明确属于此阶段的墓葬有洛阳矿山厂M2035，墓葬年代不早于正始八年，但应不出曹魏后期。洛阳西朱村M1与之特征较为近似，年代应大体相当。洛阳东郊M178和新安C12M262特征较为近似，相比前两者可能略晚，年代下限可能至西晋初年。

洛阳矿山厂M2035墓道东向，斜坡墓道两侧有5级台阶，为前后双室砖墓，由墓道、前甬道、方形前堂、耳室、后甬道、长方形后室组成。地面用砖错缝平铺，墓壁为二顺一丁和平砖顺砌相结合砌筑。随葬陶器包括陶井、灶、碓、圈厕、鸡、狗、樽、案、耳杯等，但圈厕不再是汉代以来流行的角屋式，即小厕所立于猪圈上方一角，而是变为横屋式，即宽厕所横于猪圈上方一侧。矮体陶罐的流行同样是突出特点，有双沿罐12件、四系罐6件。还有熊灯、长方形榻^[63]。

洛阳西朱村M1墓道西向，斜坡墓道两侧有7级台阶，墓圻三壁也有6至7级台阶，但墓室结构已简化为前、后双室，前室近方形，后室为方形。地面用砖错缝平铺，墓壁为二顺一丁砌筑，前室为横券顶，后室可能也是横券顶。前后室间有木质隔门。已发表的随葬品包括四系罐、盘、圈厕（横屋式）、矮体侍俑、铁帐构件、石帐座等。所出石榻与安阳西高穴M2所出者近似。附近钻探发现M2、M3，可能也是曹魏墓。

洛阳东郊M178墓道南向，钻探知为斜坡状，砖券甬道，地面为小砖错缝平铺，方形前堂和侧室为土洞。随葬陶井、灶、圈厕（横屋式）、鸡、狗、磨、碓、耳杯、樽等汉式陶器，还有矮体侍俑和武士俑。陶碗内壁有篔点纹。发掘者将墓葬年代定在魏末晋初的原因是“出土空柱盘、双耳壶、武俑、低圈足碗等少量器物又不见于洛阳地区的曹魏墓中”，如今看来矮圈足碗、双耳壶在汉墓中已经出现，空柱盆亦见于安阳西高穴M2和曹植墓，但武士俑应当是相对较晚出现的器类。

新安C12M262墓道南向，斜坡墓道两侧有4级台阶，甬道内有石门，为单室砖墓。地面用砖错缝平铺，墓室壁面外弧，二顺一丁砌筑，四角有砖砌角斗，四面结顶穹隆顶，有一耳室。随葬较多的陶四系罐和碗，陶碗内壁有篔点纹，圈厕为横屋式。发现铜

帐构件、矮体侍俑和武士俑。

综上所述，曹魏后期墓葬的合葬风气趋于衰落^[64]，墓室结构向简单化发展，不乏土洞墓。仍流行方形（弧方形）前堂，带侧方台阶的斜坡墓道在高规格墓葬中仍然流行。墓壁常见二顺一丁砌法。除四面结顶穹隆顶，仍见近方形前堂采用横券顶者。随葬器物基本属于前一阶段的延续，四系罐、矮体罐、碗、盘等矮体陶容器的流行仍是突出特点，陶碗内壁饰篔点纹。常见金属帐构件，仍见石榻、盂顶形陶帐座、双夔直栏式位至三公铜镜。横屋式圈厕、长方形榻、熊灯、武士俑等陶器，又表现出向西晋墓葬过渡的特点。

（二）曹魏墓葬的主要特征

总的来说，洛阳及其附近地区曹魏墓葬在东汉墓葬的基础上，采取了扬弃的方式，并出现了少量新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曹魏墓葬继承了东汉晚期墓葬的大部分因素。曹魏墓葬在墓室结构上并无特别的创新之处，由多室墓向前后双室墓和单室墓发展，这是在汉制基础上的低配化处理方式，但高等级墓葬在斜坡墓道两侧仍然保留侧方台阶。多数随葬器物都可以在汉墓中找到来源，四系罐、矮体罐、浅腹盘、碗、案、耳杯、灯等仍在流行，灶、井、碓、磨、圈厕、鸡、狗等模型明器仍在在使用，但汉墓中流行的高体陶罐减少直至消失，先秦以来的陶鼎、壶步入终结，陶仓、楼、解注瓶、方盒等基本不见或被淘汰。

二是曹魏墓葬将东汉晚期墓葬已出现但尚未流行的因素发扬光大。最典型的例子是四系罐，瓷四系罐在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的洛阳唐寺门M1^[65]、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的洛阳烧沟M147^[66]中已有发现，但尚不多见。陶、瓷四系罐在曹魏墓葬中非常流行，数量较多，同样流行的还有矮体陶罐，在形制上与陶四系罐仅是有无“系”的

差异，功用可能相近。墓壁外弧现象在中原地区东汉墓中并不常见，也并不一定四壁皆外弧，但曹魏墓已表现出明确的四壁外弧特征。双夔直栏式位至三公铜镜虽在东汉出现，却也是在曹魏时期开始流行。

三是曹魏墓葬存在对旧因素的改造并出现少量新因素。曹魏墓的方形或近方形券顶前堂应是汉式横前堂的简化形式。陶圈厕由东汉以来的角屋式改变为横屋式。空柱盆、圆形榻、矮体侍俑等在曹魏前期已有，陶碗内壁开始流行篦点纹，出现盃顶形陶帐座。长方形榻、熊灯、武士俑等在曹魏后期也已有。以往所知西晋墓流行的一些因素在曹魏墓中已经出现，在缺乏纪年材料和自证墓主材料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根据新因素的存在，而将其归入更晚的年代阶段。

三、研究启示和学术意义

南楚楼M3为曹魏墓葬的辨识，为深入探讨曹魏前期墓葬的时代特征确立了重要的研究对象，为进一步辨识更多的曹魏墓葬提供了参考。相较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群能够更为精准地反映墓葬的时代特征。虽然随葬陶器仍然延续汉代形制，但组合关系已发生变化，既不同于典型汉式陶器组合，又尚未构成典型晋式陶器组合，表现出中间形态的组合特征。通过随葬陶器组合和特定随葬品组成的考察，可将其放入汉晋墓葬序列中，从而推定为曹魏墓葬。以南楚楼M3为参照，巩义石家庄M11、温县南张羌M141、南楚楼M4等特征近似者也有可能是曹魏墓葬。结合其他地区的曹魏纪年墓，还将有望为辨识更多的曹魏墓葬提供参考。

从汉晋纪年墓和该阶段具有明确墓主信息的墓葬资料看，不同朝代墓葬在物质文化面貌上通常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突出反映在文化因素的传承、扬弃、改造和融合所造成的组合关系变化。对于曹魏墓葬时代特征的新认识，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考

古年代学研究和王朝更替与文化异同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注 释

- [1] a.李宗道、赵国璧：《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b.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
- [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
- [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葬》，《考古》2017年第7期。
- [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西晋墓（C12 M262）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2期。
- [7] a.刘明等：《洛阳曹魏墓及相关问题》，《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b.赵俊杰：《中原地区汉末至曹魏时期的墓葬等级与葬俗变迁的阶段性》，《中州学刊》2010年第4期。
 c.韩国河、朱津：《三国时期墓葬特征述论》，《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
- [8] a.徐殿魁：《试述洛阳地区曹魏墓的分期问题》，《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b.朱亮、李德方：《洛阳魏晋墓葬分期的初步研究》，见《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
 c.魏青利：《洛阳地区东汉晚期至西晋墓葬制度的差异》，《决策探索》2007年第3期。
 d.杨晓芳、潘玲：《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洛阳地区墓葬形制研究》，见《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辽海出版社，2013年。
 e.刘中伟：《洛阳地区曹魏时期墓葬及相关问题初探》，《殷都学刊》2016年第1期。
 f.刘中伟：《洛阳地区曹魏墓葬对汉文化的继承与变革》，《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 [9] 同[8]b。

- [10] 倪润安：《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3期。
- [11] 张鸿亮：《试论洛阳偃师杏园6号墓的年代与性质》，《中原文物》2021年第1期。
- [1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 [13] 洛阳地区以外，明确为曹魏时期的墓葬也极为罕见，如西安地区迄今仅发现长安广丰公司办公楼M13，所出神瓶之上有朱书文字“景元元年……”，可知该墓年代在曹魏末年。参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三国曹魏纪年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
- [14]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春都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0期。
- [15] a.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三国—宋元考古（上）》第15、16页，1974年。
 b. 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c. 苏哲：《西安草厂坡1号墓的结构、仪卫俑组合及年代》，见《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文物出版社，2002年。
 d.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123、1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 [16] 荥阳文物志编纂委员会：《荥阳文物志》第91~96、272、27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
- [1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荥阳晋墓、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9期。因距南楚楼村较近，本文将其称为南楚楼M3、M4。本文内南楚楼M3材料皆引自此简报，以下不再重复加注。
- [18] 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古》2012年第4期。
- [19]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第59~61、63、235、23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 [2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纺机油库发现的一座汉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3期。
- [2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衡山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7期。
- [23] 李梅田：《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的弧壁砖室现象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7期。
- [24]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郑州市碧沙岗公园东汉墓》，《考古》1966年第5期。
- [25]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新郑市和庄镇周庄汉墓发掘简报》，《华夏文明》2016年第3期。
- [26] 鹤壁市文物工作队、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河南鹤壁市后营汉代墓地发掘简报》，见《考古学集刊》第27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 [27] a. 同[3]。
 b.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厚载门街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1期。
- [2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登封双庙战国秦汉墓地》第137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汉墓》第80页，大象出版社，2013年。
- [30] 同[3]。
- [3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发现的两座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3期。
- [3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FM5）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 [33]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河南荥阳鲁庄墓地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0年第1期。
 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荥阳鲁庄墓地》第28页，科学出版社，2021年。
- [3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郑州市鸿城服饰广场3号东汉墓发掘简报》，见《文物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 [35]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同洲花园小区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汉唐考古增刊”。
- [36]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巩义市新华小区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 [37] 洛阳博物馆：《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

- [38] a.刘振东:《新见汉晋南北朝时期的帷帐》,《文物》2018年第3期。
b.同[18]。
- [39] 温县文物管理所:《温县南张羌汉代墓地》第14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
- [40]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等:《河南温县南张羌西晋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6期。
- [4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 [42] a.河南省文物工作第二队:《洛阳涧西16工区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
b.霍宏伟、史家珍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上)第194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 [43] 韩茗:《东汉连弧纹镜相关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4期。
- [44] 徐萃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
- [45] 韩茗:《汉晋时期双头龙纹镜研究》,《考古学报》2020年第1期。
- [4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第131~136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47] 同[20]。
-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辉县汉墓群出土铜镜修复、保护与研究——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研究项目》第368、369页,文物出版社,2022年。
- [49]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随县唐镇汉魏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2期。简报根据唐镇M3所出剪边五铢、直口四耳瓷罐、半圆方枚神兽铜镜和位至三公铜镜,推断该墓“时代约当三国”。如今看来,所举器物皆不是能够将墓葬年代定为三国时期的过硬证据。结合该墓为直壁而非外弧壁,且墓顶推测为“四面结顶”而非四隅券进式,其年代上限可能在东汉晚期。
- [50]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第197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51]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第226页,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
- [52] 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13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 [53]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昌青云谱汉墓》,《考古》1960年第10期。
- [54]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订本)第5~8页,中华书局,2020年。
- [55] 同[20]。
- [56] 同[31]。
- [5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上街水厂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 [5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 [59] 刘玉新:《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
- [60]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巩县石家庄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2期。
- [61] 东阿文化馆:《山东东阿县鱼山曹植墓发现一铭文砖》,《文物》1979年第5期。
- [62] a.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鄂城六朝墓》第274页、图版104-2、4,科学出版社,2007年。
b.鄂州市博物馆编:《鄂州铜镜》第64、67页,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
- [63] 《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未明确指出该墓有长方形榻,墓葬平面图上编号32的器物仅称“陶器”,但确能看出方形器物的部分轮廓。该墓所出长方形榻M35:32的资料和图像收录于谢虎军、张剑:《洛阳纪年墓研究》第55页,大象出版社,2013年。
- [64] 曹魏后期合葬风气的衰落在文献记载中也有体现,如《晋书·帝纪第一》记载,司马懿死于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其遗命指出“后终者不得合葬”。
- [6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 [66]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第62、6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责任编辑 刘天歌)